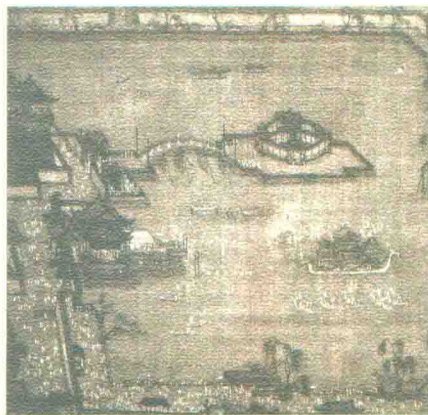




中原学术文库·文集

任崇岳学术文集

任崇岳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中原学术文库·文集

任崇岳学术文集

任崇岳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任崇岳学术文集 / 任崇岳著. — 郑州 : 大象出版社, 2017. 5

(中原学术文库. 文集)

ISBN 978-7-5347-8488-0

I. ①任… II. ①任… III. ①史学—中国—文集
IV. ①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8933 号

中原学术文库·文集

任崇岳学术文集

任崇岳 著

出版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石更新

责任校对 裴红燕 毛路 张迎娟

装帧设计 王晶晶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洛阳和众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6.25

字 数 428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20.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洛阳市高新区丰华路三号

邮政编码 471003

电话 0379-64606268

自序

岁月不居,时光如流,弹指间已届耄耋之年,屈指算来,从事科研已有四十个春秋,而今已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矣。回眸平生,无限感喟。虽有数十本论著梓行,但尚未入史家藩篱,更遑论登堂入室!对于前贤空怀仰慕,徒增效顰之恨。所幸如今政通人和,海宴河清,不才如我才得以经营菟裘、读书自娱。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小引”有云:“遭时承平,得优游林下,寝馈于文史以送老,书生之幸多矣。”信哉斯言!

流年似水,往事如烟。四十年前余忝列元史大师翁独健教授门墙。先生哈佛大学博士,著作等身,饮誉海内外。解放前代理过燕京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副所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蒙古史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会长。虽政务丛脞,仍耳提面命,诲人不倦,使人如坐春风,如饮醇醪。前尘往事,恍如昨日,而先生魂归道山已三十年矣。清人戴震执教杏坛,后学名家甚众,而最能光大其业者,莫如著《说文解字注》之段玉裁、著《广雅疏证》之王念孙及其子王引之。余不能光大先生之业,清夜扪心,徒增惭怍。每念及兹,不禁泫然!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树立良好学术道德,自觉遵守学术规范,讲究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崇尚‘士以弘道’的价值追求,真正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执着坚守,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殷殷之情,溢于言表。社科院领导顺天应人,醵资出书,功崇德巨,泽被后世。余不揣鄙陋,检

索旧作,遴选一过,哀为一帙,付诸梨枣。计论文四十余篇,皆《民族研究》《学术月刊》《史学月刊》《中州学刊》等刊物已刊出者,内容大致分为宋史、元史、地方史及考证四类。戴震论学有云,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本书所收论文距这三点悬远,不过一得之愚而已。倘有恺悌君子、新朋旧雨读罢一篇,则余愿足矣!

丙申年桂月上浣 于郑州

目 录

001	论汉族形成于中原地区
016	汉代和亲政策的几个问题
023	中原移民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034	试谈民族战争与少数民族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
041	关于民族英雄评价的几个问题
051	略论冯道
060	契丹与五代山西割据政权
068	试论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及其措施
080	论辽金关系
087	论辽代契丹族对汉族文化的吸收和继承
095	从民族关系看赵匡胤统一全国的策略
104	关于抗辽名将杨业的几个问题
111	杨业新论
120	论宋金海上之盟
129	略论宋金关系的几个问题
139	南宋初年政局与绍兴和议
149	论金末政局及其灭亡原因
159	试论金代的廉政建设
169	宋元鼎革之际的知识分子

- 179 南宋初年的经济与政治形势
——绍兴和议研究之二
- 188 略谈河南省的西夏遗民
- 196 略论元代儒士社会地位演变的历史过程
- 205 元顺帝与宋恭帝关系考辨
- 214 元《浚州达鲁花赤追封魏郡伯墓碑》考释
- 220 从两通元代碑文看海都之乱的性质
- 230 河南省内黄县、清丰县的蒙古族后裔是豫王子孙吗？
- 240 王鹗与《汝南遗事》
- 249 从历史因素探索元杂剧繁荣的原因
- 257 论元代的廉政措施
- 270 张士诚评价刍议
- 276 朱元璋评价的几个问题
——与陈高华同志商榷
- 286 论朱元璋对待儒士的态度
- 295 朱元璋用人思想研究
- 304 朱元璋削平群雄统一全国的原因
- 312 元史专家翁独健教授的治学道路
- 320 台北知府陈星聚治台功绩
- 341 寒山、拾得身世杂考
- 350 郑姓的来源与迁徙
- 359 源出姜姓的中华姓氏
- 369 石壁客家移民与大槐树移民比较研究
- 379 邓姓的来源与迁徙
- 386 葛天氏与葛姓源流
- 393 卢姓的来源与迁徙
- 398 校姓的来源与迁徙
- 404 漫话茹姓
- 408 漫话孛姓

论汉族形成于中原地区

一、汉族、汉人

中华民族是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 13 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1]。在中华民族所包含的 56 个民族中,汉族是主体民族。汉族形成于何时? 费孝通教授认为:“汉作为一个族名是汉代和其后中原的人和四围外族人接触中产生的。”^[1] 吕振羽先生说:“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2] 史学家吕思勉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昔时民族国家,混而为一,人因以一朝之号,为我全族之名,自兹以还,虽朝屡改,而族名无改。”^[3] 范文澜也认为:“汉族自秦汉以下,既不是国家分裂时期的部族,也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族,而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民族。”^[4] 1957 年 3 月,三联书店出版的《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一书中,多数学者认为,汉民族在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曾经说过:“民族是社会发展到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因而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产物,中国在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才产生资本主义,汉族应形成于鸦片战争之后。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汉民族的形成应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相一致,也就是说,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之日,即是汉民族的形成之时。而资本主义何时萌芽,有说明末清初者,也有说唐宋者,这意味着汉族形成于唐宋之际或明末清初。后几种说法胶柱鼓瑟,拘泥于经典作家的片言只语或历史上的某一重大事件而置实际情况于不顾,因而同意者寥寥。如今汉族形成于汉代,已是学术界的共识。

与汉族相联系的还有汉人问题,二者有相同之处,但并非同一概念。汉族

指的是汉民族,汉人则指的是汉朝之人,南北朝时称中原人为汉人。秦朝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后,声威远被,秦朝之人遂被称为“秦人”。秦朝国祚甚短,不久,便被汉朝取代,于是“秦人”的称呼便改成了汉人。如《后汉书·耿恭传》记载,耿恭曾领兵与匈奴在西域作战,原来臣服汉朝的车师(原名姑师,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又叛归匈奴,“与匈奴共攻恭,恭厉士众击走之,[车师]后王夫人先世汉人,常私以虏情告恭”^[5]。这里的“汉人”指的是汉朝之人。同书《西域传》称,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于阗一度受另一国家莎车控制,“莎车将君得在于阗暴虐,百姓患之。明帝永平三年(60),其大人都末出城见野豕,欲射之,豕乃言曰:无射我,我乃为汝杀君得,都末因此即与兄弟共杀君得,而大人休莫霸复与汉人韩融等杀都末兄弟,自立为于阗王”^[5]。同书《南匈奴传》记载:汉朝与南匈奴交战,匈奴“单于见[汉朝]诸军并进,大恐怖,顾让韩琮曰:汝言汉人死尽,今是何等人也?”^[5]匈奴单于责备韩琮说,你说汉朝军人已死尽,这里冒出来的人又是什么人呢?这里的汉人指的是汉朝军人。《资治通鉴》卷65“汉纪57”记述建安十一年(206),“乌桓乘天下乱,略有汉民十余万户,袁绍皆立其酋豪为单于,以家人子为己女妻焉”^[6]。这里的“汉民”指的也是汉朝之人。汉族虽在汉代已形成为民族,但史乘中仍以汉人称之,这一称呼一直延续到中华民国时期。

到了南北朝时期,“汉民”已不是指“汉朝之民”,而是指汉族之人了。把持东魏朝政的高欢是鲜卑化的汉人,他的儿子高洋废东魏而建立了北齐政权。高欢曾对鲜卑人说:“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又对汉人说:“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6]高欢说此话时为大同三年(537),距东汉灭亡已300余年,此处说的“汉民”显然不是指汉朝之人,而是指汉族人了。清末光绪年间任过山西道监察御史的大学者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一书中对高欢善于调和夷夏关系作了精辟透彻的解释:

中国人别称汉人起魏末。北齐以高氏,虽云渤海蓊(今河北景县)人,而[高]欢之祖徙居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南),已同胡俗。故《北齐书·神武纪》云:“神武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及执魏政,其姻戚同起者,如娄昭、尉景、刘贵等,皆中国种族,遂目中原人曰汉人。^[7]

高欢的祖先本是河北景县一带的汉人,到他祖父时徙居今内蒙古固阳县,这里古代是鲜卑人聚居之区,高氏祖孙三代生活于鲜卑人中,已融入鲜卑族,高

欢于是成了鲜卑人。他当了东魏的丞相,独揽朝政后,提携汉人姻亲娄昭、尉景、刘贵等人。文中“皆中国种族,遂目中原人曰汉人”一句颇可玩味。在高欢看来,娄昭等人皆是中国种族(指的是中原地区的汉人),与居住在塞北的鲜卑人相对应,于是中原人便成为汉人了。明朝人汤显祖的《牡丹亭》第四十五出《寇间》一折中,有“稟大王,拿的个南朝汉子在此”^[8]。所谓“南朝汉子”云云,也指的是南朝的男姓汉族人。清人王士禛《池北偶谈》“汉军汉人”条称:“本朝制,以八旗辽东人号为汉军,以直隶省人为汉人。”^[9]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取代了清朝,明确汉、满、蒙古、回、藏为五大民族,号称“五族共和”,“大概也只是在‘五族共和’之说倡导以后,汉人才正式改称汉族”^[10]。汉族之名始于中华民国时期,但汉族这一名称是由“他称”改转为“自称”的,正如费孝通所说:“汉作为一个族名是汉代和其后中原的人和四围外族人接触中产生的。民族名称的一般规律是从‘他称’转为‘自称’。”^[1]

二、在中原地区形成的华夏族是汉族的前身

20世纪30年代,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曾在史学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此说容或有可商兑之处,但对于汉民族形成于中原地区来说,“层累地造成”的观点是惬当的。

考古资料表明,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数十万年以前,已有原始人类栖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20世纪70年代,豫南南召县杏花山及淅川县境内便发现了旧石器文化早期的人类牙齿,学术界称之为“南召猿人”。“南召猿人”和“北京猿人”的时代大致相当,都是现代黄色人种的祖先。除“南召猿人”外,灵宝的朱阳,陕县的侯家坡、赵家湾、张家湾,三门峡的水磨沟以及渑池、伊川、巩义、荥阳、汝州、西峡、卢氏等地,都发现有旧石器时代的晚期遗址。这些遗址表明,我们的先民很早就在中原大地上胼手胝足,披荆斩棘,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了。

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黄河中下游存在两大文化,即黄河中下游的仰韶文化和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龙山文化的前身是大汶口文化,黄河流域与龙山文化同一时代的还有中原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的前身是仰韶文

化。这些文化所处的时代统统被称为龙山时代。“河南的龙山文化正是在仰韶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山东的龙山文化而兴起的。所以可以说华夏文化就是以黄河中下游不同文化的结合而开始的。”^[1]费孝通先生这个见解得到了学者们的认同。佟柱臣先生认为,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就产生了华夏文化。“仰韶文化就是华夏族的前身文化的早期”,“龙山文化是华夏族前身文化的晚期”^[11]。陈连开先生认为:“河南龙山文化与陕西龙山文化等与山东龙山文化可以互相区分为另一种地区性新石器文化,然而河南与陕西龙山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大体平行发展而又互相渗透,却是一个相当典型的文化汇聚与交融的现象。这种文化汇聚与交融,反映着创造文化的两大氏族部落集团的交往、斗争、融合过程。许多事实表明最早发达于黄河中下游的国家制度、文字制度、青铜文化,其主要来源,应从黄河中下游东西相对两个文化区汇聚交融当中去追溯。”^[12]可以说,河南龙山文化与陕西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的交汇融合,就是华夏文化的源头。

人类的进化是由原始群进入氏族,然后有部落及部落联盟组织,进而有部落的成立。炎、黄二帝与颛顼时代已进入部落及部落联盟时期,从这时起才有比较可靠的历史传说。徐旭生先生认为,上古时期有三大部落集团,即华夏、东夷、苗蛮:“伏羲和女娲传说来自南方的苗蛮,太皞和少皞传说来自东方的夷,同来自西北方的华夏的传说来源非一,所以即使说有氏族或个人,而相对的世次的先后也无法知道。”^[13]这三大部落集团由相争而演变为和平共处,最终互相融合,才形成了而今的汉族。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13]这是一种以华夏为核心的正统观,强调了中原地区在中华文化起源及发展中的独断性,但也客观描述了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华夏及“四夷”相互融合的历史事实。应当指出的是,东夷、苗蛮的活动区域虽然超出了中原地区,但他们与华夏集团的相互融合过程却是在中原地区进行的。

在华夏族的发展历史中,炎帝、黄帝作为神化了的人物而彪炳史册。从先秦时代起,华夏族就尊奉炎、黄二帝为先祖。《世本》与《大戴礼记》明确归纳出以黄帝为始祖的统一谱系和以黄帝为首的五帝世系,司马迁据以作《五帝本纪》,第一次形成了华夏有同一来源的古史系统,使我们对华夏族的发展脉络有

了一个初步的认识。黄帝与炎帝曾经有过三次激烈的战争,炎帝败北,向黄帝称臣,归顺于黄帝,至此,两个集团融合为炎黄集团。“炎、黄二帝率众融合成炎黄集团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中原地区完全被炎黄集团所控制,炎黄集团的先民们深深地植根于华夏大地。炎黄集团被视为汉民族的族源,炎、黄二帝被汉族尊为祖先,至今海内外的华人都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炎、黄二帝已成为一种文化纽带,把汉民族紧紧凝聚在一起。”^[14]黄帝与蚩尤之战,尧、舜、禹与三苗之战,也都是围绕着中原地区的争夺与开发而进行的。争夺战争的结果,加速了中原文化与四方文化的交汇融合,进而加速了文明国家在中原诞生的进程。

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华夏族是历经夏、商、周三个朝代在中原地区形成的,中原地区是夏、商、周三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因此司马迁才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岳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13]嵩山因居天下中心,故称中岳。中岳在中原地区。

夏部族是黄帝后裔,居住在中原地区河洛一带,公元前 2100 年前后建立了夏王朝,这标志着我国历史已进入文明时代,华夏族的名称也随之产生。许慎《说文解字》在解释“夏”字时说:“夏,中国之人也。”夏朝所居的中国在何地? 20 世纪 70 年代出土于陕西宝鸡贾村塬的何尊铭文,记述周成王营建成周时说:“惟王初壅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又说:“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下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又民。”^[15]很显然,铭文中的中国即成周,成周即洛阳,在今河南洛阳市东郊汉魏故城一带。夏族作为夏朝的主体民族,自认为居天下之中,当然也就有四方,即东西南北的概念。夏王朝对四方不同于夏的民族称为夷,因此也会有四方夷人的概念,也就是“四夷”。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夏代已有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的观念和称谓,夏朝与东夷、南蛮关系密切。“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今安徽金寨县东南)、六(今安徽六安县北),或在许(今河南许昌)。而后举益,任之政。”^[13]皋陶,偃姓,东夷族首领。益即伯益,也称大费,东夷族嬴姓各族祖先。皋陶和益是东夷族少昊的后裔。禹为天下之君而推举皋陶与益当继承人,反映了夏族与东夷族相友善的一面。禹死于会稽(今浙江绍兴),死之前,“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今河南登封市东南)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

曰：吾君帝禹之子也”^[13]。益不但让位，干脆居住在中原地区的箕山之阳，这支东夷人后来就融入夏人中了。其实，皋陶和益仅是东夷族中比较显赫的一支，并非东夷的全部。据《后汉书·东夷传》所说，夷有九种，即“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这些夷族在夏代皆称九夷、诸夷，他们分布于西起豫东平原，东达东海之滨，南至淮水流域，北到济水地区等夏王朝的东方地区。^[16]他们原来服从夏王朝的统治，“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已后，世服王化，遂宾于王门，献其乐舞。桀为暴虐，诸夷内侵，殷商革命，伐而定之”^[5]。终夏之世，东夷人时服时叛，交往既多，夏、夷之间融合之处就越多。夏王朝的南部还有生活于今河南南阳盆地与湖北江汉平原之间的三苗部族。大禹时夏部族与三苗曾有过激烈的战争，以三苗败北而告终。《墨子》卷五《非攻下》云：“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苗师大乱，后乃遂几。”^[17]三苗溃败后，一部分迁居南方，一部分居住原地的归依夏王朝，后来这些三苗族便融入华夏族中了。

继夏朝而立的是商朝。殷人是东夷族，据说是帝喾后裔契的子孙。商人因其始祖契封于商而得名，商地即今河南省商丘市。商朝的主体民族是夏族，朝代鼎革之后称商人。其他族是少数民族，在文献记载中称为“方”或“邦”，甲骨文中则称为“方”，其实“方”“邦”含义相同。商王朝与方国之间既有和平共处的一面，也有桴鼓相攻的时期。这些方国一方面承认商王的共主地位，并通过纳贡等形式表示对商王朝的臣服，另一方面又觊觎商王朝的财物而不时发动掠夺战争。商朝的北方和西北方有土方、舌方、鬼方等游牧民族。郭沫若认为：“舌方和土方居住在今陕西西北部直到内蒙古河套地区，而鬼方则活动在今陕北、内蒙古及其以北的辽阔地区。”^[18]陈梦家认为：“鬼方在晋南，西周春秋时期在陕西境内。”^[19]邹衡则认为土方在今山西石楼县一带，鬼方在山西南部，夏商之时或当靠北。^[20]商高宗用了三年时间打败了鬼方，鬼方的一部分人被迫西移，一部分则迁入了中原内地。考古资料证明，商朝中期以后，山西境内的考古文化分为两种类型，其中分布在晋东南地区的一种与郑州、安阳等地的商文化基本相同，同属于商文化的一部分。居住在商朝北方的少数民族生存环境恶劣，那里气候严寒，赖以生存的物资匮乏，他们需要不断迁徙以寻找新的牧场和狩猎场所，在南下过程中与商人兵戎相见，便不可避免了。

居住在商朝西方的是羌族等，总称西戎。甲骨文中有关羌的卜辞甚多。

《诗经·商颂·殷武》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常”即长，君长也。这是说西方的氐羌都把商王当君长看待。羌族主要分布于岐周之西，即今之青海、甘肃地区。他们也是随牲畜迁徙的游牧族，有一部向东移动，与华夏族交错居住。商朝与羌人之间也有战争，武丁时伐羌用兵最多的一次达 1.3 万人。商人俘获的羌人多用于奴隶劳动和祭祀，生存下来的羌人后来都融入了商人中。商王还曾娶羌女为妻，表明商、羌在民族融合的道路上已开创了先河。商朝的南方有荆楚，西南方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这些族群在不同程度上受商朝的控制。商王武丁为了展疆拓土，曾南征荆楚。《诗经·商颂·殷武》云：“挾彼殷武，奋伐荆楚，深（深）入其阻，哀荆之旅。”诗中“挾”是迅疾的样子，“殷武”即殷王武丁，“阻”是指险要之地，“哀”是指俘获，“旅”是指士兵。这是说武丁深入荆楚的险要之地，俘获了他们的士兵。庸、蜀等八国在江汉之南，他们受商文化的影响，与商文化关系密切。商的东方是东夷集团，甲骨文称东方夷人为“尸方”“儿方”“人方”。商朝曾多次对东夷发动战争，尤其在帝乙、帝辛之世，商王对东夷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都大获全胜。帝乙末年迁居到沫，即今河南淇县的朝歌。“其子纣继位后，继续对东夷用兵，费了很大力量，打退了东夷的扩张，俘虏了‘亿兆’夷人作自己的军队。纣对东南的经营，使中原文化逐渐发展到了东南，对我国历史有一定的贡献。”^[18]纣俘虏来的数量庞大的东夷人，后来便融入华夏族中了。

周人是兴起于渭水流域的羌族，至武王时灭掉殷商，建立周朝。西周时期夏、商、周三族融合的雏形已日渐形成，三族交叉居住，彼此的族群差异逐渐减少，民族理念上也渐趋一致。他们都拥有共同的祖先观念，奉黄帝为共同始祖；在地域上，商、周两族都认为其祖先起源与兴起的地域都是大禹开拓的，周人称其兴起的西土为“区夏”。他们都有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以青铜技术与甲骨、钟鼎文字为代表的文化，都有共同的祖称——夏、中国。可以说，夏、商、周三族到西周时已具备了属于同一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条件。

周平王迁都洛邑，是为东周。至此，夏、商、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在中原地区，“与此同时，边裔的戎、狄也乘机内徙，与中原诸夏杂居。当时中原内地，几乎到处都有戎狄。周襄王娶戎狄女为后”，于是戎狄或居于陆浑（今河南嵩县），东至于卫（今河南滑县一带），“侵盗暴虐”^[13]。与陆浑之戎同时迁往中原的还有阴戎。《后汉书》卷 87《西羌传》云：“允姓戎迁于渭汭，东及轘辕。在

河南山北者,号曰阴戎。阴戎之种,遂以滋广。”^[5]渭南即今陕西渭河入黄河处,轘辕即轘辕山,在今河南偃师东南,允姓戎与阴戎所居之地大部分在今河南境内。后来陆浑戎叛晋,为晋所灭,这一部分人融入华夏族中。伊洛阴戎后来也为韩、魏两国所灭,除一小部分西迁外,其余的都融入到了华夏族中。戎蛮夷狄不仅杂居内地,就是周天子所居住的洛阳周围也遍布戎蛮夷狄。《国语》卷16《郑语》记载:“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21]其中狄、鲜虞、潞、洛、泉、徐、蒲、隗都是赤狄、白狄或其他诸狄,莒为东边之夷,荆为南边之蛮。这些少数民族群在进入中原之前,社会发展比较缓慢,既无姓氏,也不知诗书礼仪为何物,进入中原后,受到华夏文化的熏陶,逐渐有了姓氏、文化和风俗,习惯上也逐渐向华夏族靠拢,与中原保持一致。同样,中原诸夏也从戎、蛮、夷、狄中学到了不少东西。经过春秋战国500余年的纷争与迁徙,进入中原地区的蛮、夷、戎、狄已大部分融入华夏族中,成为后来汉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活动于边裔地区的各族,有的也融入了华夏族,有的虽未融入,但与中原华夏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华夏族共同体一起,成为中华民族多元共同体的组成部分。“经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在战国已实现华夏的大认同,华夏已形成了稳定的民族共同体。”^[22]

三、秦朝车同轨书同文等政策促进了汉民族的形成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公元前207年秦朝灭亡,秦朝在历史上只存在了15年,是个短命王朝。尽管如此,秦朝所颁布的一些法令、措施,却加速了汉民族在中原地区形成的进程,可谓功莫大焉!

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战国时,“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严重阻碍了华夏各族的交往,迟滞了汉民族形成的过程。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秦始皇下令:“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镬,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13]秦始皇

采取这些措施的初衷在于加强秦朝的封建统治,使秦王朝亿万斯年地传下去,但在客观上却加速了汉民族形成的进程。

秦朝统一全国后,废除分封制,实行中央集权,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设守、尉、监,实现了华夏族的统一。秦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秦国夺取了岭南越地,设桂林(今广西桂平)、南海(治番禺,今广东广州)、象郡(今广西崇左),把南方的大片土地收入囊中,同时徙百姓 50 万人戍守五岭,与越杂处。在北方,派“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秦汉时称内蒙古河套一带为河南),为四十四县。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6]。于是秦朝的疆域北至内蒙古,南至岭南,东至于海,西至甘肃,实现了政治的统一,西周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不复存在,秦朝的政令如臂使指,通行无阻,正如汉人贾谊在《新书》中所说:“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驭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而鞭笞天下,威震四海。”^[23]政令的统一,增强了华夏族的凝聚力。

书同文是秦朝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举措。我国的汉字从远古的结绳记事到形成汉字,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即使从商代后期算起,也有 3000 余年的历史。到了战国时期,由于长期的分裂割据,各诸侯国自成一体,政治、经济、文化均有差异,而百姓之间更是老死不相往来,以致再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如,“一个‘马’字,齐有三种写法,楚、燕、三晋各有两种写法。一个‘安’字,齐、燕各有两种写法,三晋竟有四种写法”^[24]。文字的混乱,给诸侯国带来了不少麻烦,不但阻碍了文化的发展,而且严重影响了诸侯国文书的传播,更不利于华夏族的统一与稳定。有鉴于此,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采纳丞相李斯“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的建议,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秦始皇二十八年(前 219)两次下诏,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并吸纳参照六国文字制定小篆,作为法定的主要字体,以隶书作为日常使用文字,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同时,秦始皇命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毋敬 3 人分别用小篆作《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又命程邈作隶书,作为文字范本颁布全国。这一举措结束了战国以来“文字异形”的局面。不过,小篆虽是法定字体,但隶书笔画平正,便于书写,在民间流行更广泛,到了汉代,隶书终于取代小篆成为主要文字。秦代统一文字和隶书的广泛使用,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文化发展,更是汉民族形成的必要前提。

统一货币和度量衡是秦朝的又一重大举措。战国时各国货币的形制与轻重、大小不尽相同,不利于各地的经济交流。秦朝规定以黄金为上币,单位为镒(20两);以秦国过去流行过的圆形方孔铜钱为下币,文曰半两,重量也是半两。货币的统一,促进了商贸往来,使得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在经济上联系得更紧密了。度量衡制度在战国时期也不统一。比如度量长短的尺子,竟然长短不一,即使在楚国一国之内,铜尺长度就相差好几厘米。再如量制、衡制,各国也是自行其是,极不统一,甚至名称都不相同。如魏国的量制分为益、斗、斛,齐国则以升、豆、区、釜、钟为单位。衡制更是混乱,名称也不一样。比如赵国的衡制单位是铢、镒,楚国的衡制单位称铢、两、斤,周朝的则称铢、折。因为度量衡既是商品交换的必需工具,国家税收也需用度量衡,度量衡制度不统一,造成了经济混乱,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秦朝统一全国后,采用商鞅制定的度量衡标准器,把全国的度量衡统一起来。“文字、货币、度量衡的统一,为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促进了统一国家的发展。”^[25]秦朝时汉民族尚未形成,但秦王朝施行的许多措施为汉民族的形成作了强有力的铺垫。

四、汉族形成于中原地区

“汉承秦制”,是指汉朝在职官制度、郡县制上承袭了秦朝的做法并有所发展。职官制度保证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便于政令畅通无阻;郡县制则把编户齐民固定在一定地域的土地上,为国家缴纳贡赋。这两大措施加速了汉民族在中原地区的形成。

共同的地域是形成一个民族的首要条件。人类社会都是先由血缘关系发展为地缘关系,然后再逐步发展为部族、民族,因此,人与地域的关系,对于一个民族共同体来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不可能设想,居住在山南海北,从未生活在一起的不同人群,会形成民族。到了汉代,汉人的基本分布区域为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以西汉元始二年(2)为例,当时诸州总户数为12356470户,共57671401口。这些都是赋税户口数字,基本上是汉人,极少数可能是编入户籍的边郡中的当地民族。在总人户数中,黄河中下游及淮河以北6州合计占总户数的52.8%,占总人数的62.54%。长江中下游荆、扬及